

企业文化安全视角下智慧港口经济发展研究

一、AI嵌入港口管理的现实动因与文化安全问题

随着智慧港口建设推进,人工智能正由生产作业端向管理职能端延伸,逐步嵌入港口企业组织运行和管理决策等环节。港口行业具有作业链条长、协同环节多、技能要求高和安全责任重等特点,传统管理方式已难以充分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AI通过智能调度、数据分析、流程优化、数字化培训和辅助决策等方式,提高管理精准性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港口企业由经验驱动向数据支

撑的转变。从经济效率看,AI有助于降低管理成本、增强组织响应能力;从企业文化看,AI也在重塑企业内部的信息流动、协同机制和价值运行逻辑。由此产生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在提升港口经济效率的同时,防止企业文化安全被技术逻辑所削弱。

二、经济效率逻辑与企业文化安全张力的生成机理

AI嵌入港口管理可能引发文化安全风险,根源在于经济效率逻辑与企业文化安全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企业文化安全不仅包括数据

安全、隐私保护,更包括价值认同、心理安全、组织信任、经验传承和员工归属感。港口企业长期形成的文化强调团队协作、岗位责任、工匠精神和人文关怀,而AI管理更强调标准化、数据化、算法化和可计算性。当岗位评价、绩效分析、培训推荐、流程监管等环节由算法介入时,管理效率可能提升,但员工也可能产生被监控、被量化、被替代的感受,原有的人际信任和情感连接可能被削弱。尤其在港口技能传承中,企业长期依赖“师徒带”、现场经验和团队协作,若AI过度替代人际互动,容易造成经验传递弱化和文化传承断裂。因此,AI嵌入

并非单纯的技术效率问题,而是涉及企业价值秩序和组织共同体重构的问题。

三、企业文化治理赋能智慧港口经济发展的优化路径

破解AI嵌入港口管理中的效率—文化悖论,关键在于构建人机共生的企业文化治理框架。首先,应将企业文化安全纳入智慧港口建设和AI治理体系,在技术应用前同步评估组织认同、员工信任、感知公平、隐私保护和文化适配等因素,避免只重视经济效率而忽视文化影响。其次,应明确AI的辅助定

位,AI可以提供数据分析、流程支持、风险提示和决策参考,但在价值判断、员工发展、组织沟通和文化传播等事项中,应保留管理者的解释、沟通和最终判断权。再次,应建立算法透明和责任机制,说明AI应用场景、数据来源、评价标准和决策边界,减少员工对算法黑箱的疑虑。最后,应传承“师徒带”、工匠精神和团队协作等传统优势,推动经验知识数字化、文化传播场景化和员工成长体系化,使AI成为提升组织效率、延续企业文化和促进港口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

作者:梁连升(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文化赋能经济价值创造:国有监理企业全过程工程咨询转型研究

一、企业文化赋能转型的现实逻辑

在工程建设模式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国有监理企业正面临由施工阶段监督服务向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转型的现实要求。传统监理模式主要聚焦于施工阶段质量、安全和进度控制,服务链条相对单一,难以充分适应项目投资决策、勘察设计、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一体化管理需求。全过程工程咨询强调跨阶段、跨专业、集成化服务,要求监理企业由单一监督角色转向综合管理和价值创造主体。对国有监理企业而言,这一转型不仅是业务范围

体系的和管理模式的系统重构。只有以企业文化凝聚转型共识,突破传统监理思维惯性,增强全生命周期咨询服务能力,才能在行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竞争加剧中形成新的经济价值创造优势。

二、企业文化驱动能力重构的核心机制

国有监理企业能力重构主要体现为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协同提升,其深层支撑在于企业文化对组织行为和价值导向的引领。首先,技术能力需要由施工现场监督向全过程咨询技术服务延伸,覆盖前

期策划、设计优化、造价控制、施工管理和运维服务等环节,并借助BIM、无人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具提升工程量计算、进度管控、风险识别和质量追踪能力。其次,管理能力需要由单一项目监理管理向跨阶段、跨专业的综合项目管理升级,形成统筹质量、安全、成本、进度和风险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再次,组织能力需要由传统职能式结构向平台化、矩阵化和协同化组织转变,建立适应全过程咨询业务的人才梯队和资源整合机制。上述能力在企业文化引领下形成闭环,推动文化优势转化为服务集成能力和经济价值创造能力。

三、企业文化赋能经济价值创造的实践路径

面向全过程工程咨询转型,国有监理企业应从战略重塑、数字赋能和品牌提升三个方面培育经济价值创造能力。首先,应明确由传统监理服务商向工程管理全周期服务商转型的发展定位,以企业文化为指引统一组织认知和行动方向,围绕交通、市政、房建、城市更新、智慧工程等领域拓展综合咨询服务,形成差异化业务布局。其次,应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咨询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通过数字

别机制,推动监理服务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并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完善人才评价、培训和激励机制。再次,应通过标杆项目建设、区域市场拓展和服务品牌塑造等方式提升市场影响力,使企业文化转化为品牌价值、服务价值和品牌价值。总体来看,全过程工程咨询转型不是传统监理业务的简单扩展,而是国有监理企业发展逻辑和价值创造方式的深层变革。唯有以企业文化凝聚转型共识,以数字化和人才建设支撑业务升级,才能培育持续竞争力和经济价值创造能力。

作者:蓝柳宸(广西桂通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与人口老龄化相适配的养老金融体系

摘要:国内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居民养老资金储备需求同步扩张,现有养老金融供给模式与老龄群体多层次、差异化养老需求存在匹配偏差,完善适配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养老金融体系成为现阶段社会保障领域的重点任务。本文立足国内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框架,聚焦制度完善与市场机制优化双重方向,旨在通过制度调整与业态革新等方式补齐养老金融发展短板,为应对长期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金融层面的长效支撑。

关键词:建设;人口老龄化;相适配;养老金融

养老金融体系作为衔接社会保障制度与资本市场、养老服务业的中间载体,其发展质量直接决定老龄群体晚年收入稳定性与生活保障质量。为此,养老金融体系建设需要兼顾普惠属性与市场化属性,既要依托公共政策夯实基础养老资金底盘,也要发挥市场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与资产管理能力,通过多层次制度安排与业态整合,形成能够动态适配老龄化发展节奏的长效运行机制。

一、依托养老保险三支柱夯实养老金融体系建设基础

深度老龄化环境下养老金融体系建设需要依托养老保险三支柱完善配套运行机制。基本养老保险层面,持续优化基金统筹调剂机制,扩大全国统筹实施力度,动态调整财政补贴分摊比例,依托规范化投资运营拓宽基金增值渠道,缓解现收现付模式下长期收支承压问题,同步完善城乡居民参保激励规则,稳步扩大基础保障覆盖范围,夯实养老金融体系底层资金底盘。聚焦企业年金与职业年金领域,调整企业缴费税收优惠标准,简化中小微企业年金设立流程,降低企业运营负担,拓展年金参与主体范围,针对不同行业经营特征设置差异化缴费方案,补充养老资金存量规模,搭建年金资产多元化投资组合框架,实现积累资金长期稳定增值。个人商业养老保险板块,完善税收递延、专项补贴等配套激励政策,拓宽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参与渠道,引导居民主动开展养老资产规划,打通三支柱个人账户信息互通通道,建立统一的账户归集、资金划转、待遇衔接规则,消除三支柱独立运行形成的制度割裂问题”。统筹

推进三类养老保险制度协同升级,能够理顺养老资金全周期积累路径,从资金供给端补齐养老金融体系短板,平衡当期养老待遇发放与远期老龄保障储备之间的资源分配关系,为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撑。

二、创新养老保险和养老服务融合的多层次产品体系

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涵盖了基金获取、日常护理、医疗康复、长期照护等各个方面,传统的养老金融产品只注重资金支付功能,并不能满足实际的养老服务供给需求,因此需要通过产品体系的创新来打通金融资产权益和线下养老服务权益之间的转化通道。保险机构可以调整养老产品的设计逻辑,将养老服务权益兑换规则嵌入基本年金给付条款,参保人可以根据账户累计资产额度兑换机构合作养老机构入住、居家上门护理、康复理疗等实体服务,弱化单一现金给付的产品设计,匹配老龄群体多元化生活需求。在产品模式方面,区分低风险健康、失能半失能、高龄独居三种人群的需求差异,低风险群体产品注重资金增值和旅居养老权益匹配,失能群体产品强化长期护理费用垫付

和医疗资源对接相关条款,高龄群体产品则简化资金申领、服务申请操作流程,形成分层分类的养老金融产品供给结构。

三、构建资金端、产品端、服务端三端协同生态

资金端作为养老金融体系的源头,依托政策性引导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流入养老领域,优化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配套机制,降低社会资本参与养老资金运营的风险成本,持续扩充养老金融体系整体资金存量。产品端承担养老资金转化为养老保障工具的核心职能,各类持牌金融机构作为产品供给主体,需建立标准化业务协同机制消除行业壁垒。银行、保险、理财、信托行业统一养老金融业务基础规范,打通账户体系、资产登记、权益核算等底层数据,实现不同品类养老金融产品资产信息互通。服务端包含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医疗康复等实体养老业态,是养老金融价值落地的最终载体,服务机构与金融主体需建立稳定长效合作框架。在此基础上搭建统一的养老服务信息共享平台,同步对接金融机构客户数据与养老机构服务资源,依据老龄群体资产储备、年龄、健康状况匹配对应养老服务

方案,提升资源配置精准度。资金端、产品端、服务端之间建立常态化联动调度机制,依托数字化信息平台实现三方数据实时互通,资金供给规模变动同步传导至产品研发节奏,产品市场需求变化反向引导养老服务业态升级,形成三方动态适配的内生调节机制。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长期发展趋势决定养老金融体系建设,属于持续性系统工程,体系完善工作需要同步推进制度优化、产品革新、业态协同等多项任务。后续体系完善工作需持续依托政策引导,强化各类主体协同意愿,同步优化养老资金投资监管、产品信息披露、养老服务履约监督等相关配套规则,持续平衡养老金融的安全属性、收益属性与服务属性,依托长效稳定的养老金融运行机制,持续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压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构建可持续、多层次、全覆盖的现代化养老保障支撑体系。

作者:赵丹丹(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陈林.中国养老金管理的战略意义、面临形势与发展思考[J].新金融,2026(6):8-15.

碳金融重塑金融格局: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引言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我国“双碳”目标推进进入关键阶段,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3.8%左右”列为年度约束性指标,标志着低碳转型从顶层设计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碳金融作为连接金融资源与低碳转型的核心枢纽,正系统性重塑传统金融格局。

当前学术界对碳金融的研究多集中于碳市场交易机制、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等单一维度,较少从金融体系整体变革的视角系统分析碳金融对金融机构业务模式、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的全方位影响,尤其缺乏结合2024年以来最新政策调整与行业运行数据的实证梳理。鉴于此,本研究结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开披露的2024—2026年行业数据,从四个核心维度拆解碳金融重塑金融格局的内在逻辑,总结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金融机构转型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因此,本研究基于“双碳”战略背景,结合2024—2026年最新行业数据,从业务增长空间拓展、信贷结构深度调整、风险管理体系升级、金融数字化融合四个维度,梳理碳金融对金融业的影响路径,剖析其带来的万亿级绿色投融资机遇与资产搁浅、气候风险上升等深层挑战,并提出金融机构转型的协同路径。结果表明,碳金融已推动金融业从传统资金中介向综合绿色服务商演进,未来需进一步完善碳核算、信息披露等基础制度,实现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协同。

二、战略导向下金融领域的变革

党中央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明确为一项重大的战略部署,2026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起步年,“双碳”目标的推进进入了关键阶段。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它在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自身也要同步完

成结构上的转型,碳金融活动正从多个方面重新塑造传统金融业,包括经营逻辑、业务做法、风险格局等方面,一方面它给金融业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提高此类深层难题,推动着整个金融体系朝着更绿色、更数字化和更精细的方向去升级。

三、金融领域在多个维度上的重塑和演进

(一)碳金融带来了新的业务增长空间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绿色信贷在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里,已成为了增长最快的类型之一,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到,截至2024年末,六家国有大型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累计达23.8万亿元,增速比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更高。2026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1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7.6%,仅这一个季度就新增了3.29万亿元,其中,国有大型银行发挥着引领作用,建设银行2026年一季度的绿色贷款余额为6.6万亿元,中国银行为5.45万亿元。

围绕碳金融的产品创新还在不断涌现,把碳排放权作为质押的贷款、与碳表现关联的贷款、碳资产回购等新融资方式正在慢慢铺开。南京银行推出了将企业碳履约情况与贷款利率挂钩的贷款模式,到2024年末,南京银行上海市内15家分支机构累计落地了碳排放权质押贷款38单,质押的碳配额达27万吨,这类创新型产品已经在不少地方被成功复制推广。在中间业务拓展方面,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的财务顾问、碳排放核算咨询等,已经变成了银行新的收入来源,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开展碳排放核算,随之而来的合规咨询需求快速增长,商业银行正从提供融资的中介,朝着综合化绿色金融服务商转变。

资本市场的联动效应也在持续显现,2025年上半年我国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达

到了4900.50亿元,同上年相比增幅达90%,全年绿色债券的发行总规模突破了1万亿元,绿色金融债和绿色中期票据是其中的核心发行品种,为绿色项目提供了长期并且稳定的直接融资支持。

(二)碳金融迫使信贷结构进行深度调整高碳排放行业的融资约束正在变紧,碳市场通过碳价格信号以及配额的约束,把高碳企业融资的成本直接抬高了,2024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之后,全国的碳市场进入了法治化运行阶段,到2025年,碳市场已经扩展到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碳价上涨使得企业债务的风险溢价跟着上升,这就促使银行去收缩对高碳行业的贷款供给。

资产重新定价的风险突出,银行手里持有的煤炭、钢铁、石化等高碳行业的存量信贷资产,正面临着“搁浅”的风险,一部分与化石能源相关的资产很可能会丧失经济价值,进而引起金融机构的资产减值和损失,如何在支持实体经济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行业的核心问题。

信贷资源向低碳领域倾斜的趋势还在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着银行把更多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上去。从2024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通过碳减排支持工具引导发放的碳减排贷款累计超过1.5万亿元,带动年碳减排量接近2亿吨;到202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支持范围扩大到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三大类,利率从1.50%降到了1.25%,这进一步降低了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2024年末,该工具累计激励发放的贷款超过了1.3万亿元,到2025年三季度末,浙江省的碳减排贷款同比增长了23.8%,带动的年度碳减排量大约为1247.4万吨,到2025年11月末,湖南省的碳减排贷款达到了365.3亿元,带动的碳减排量超过了700万吨,政策的引导效果持续显现。

(三)碳金融推动风险管理体系升级气候风险已经从一种“外部性”的东西,

变成了金融机构内部要面对的风险,这里面包括了转型风险,也就是政策变动、技术迭代让高碳企业偿债能力下降的风险,还有物理风险,即因极端气候事件影响抵押物价值和项目现金流的风险,以及碳价波动的风险,当前碳价还没有被系统地纳入到金融机构的信用评价和贷款决策流程里面去,对这类风险进行量化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急需完善风险评估的框架。

银行需要建立一套新的风险评估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要把碳排放强度、企业碳足迹等指标纳入到客户评级模型当中,还要开发出来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工具,动态地去评估高碳资产的减值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金融机构碳核算技术指南(试行)》,这给银行去量化碳风险提供了一个标准的依据,部分银行已经启动了覆盖煤炭、钢铁等重点高碳行业的气候风险专项压力测试,为贷款决策提供了可量化的支撑。

碳核算和环境信息的披露已经形成了合规方面的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银行系统去识别、量化、管理与环境有关的风险,2026年,上市公司正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强制披露的阶段,要求把与气候相关的影响信息也披露出来,银行可以获取的企业碳数据质量明显地提高了,不过信息披露的成本和合规方面的要求同样变高了。

(四)碳金融促进金融创新与数字化的融合碳金融在推动传统业务模式发生变化,银行不再只是资金的提供方了,而是逐步变成了碳资产方面价值的发现者与风险的管理者。拿江苏零碳园区建设来说,当地出台了专项的方案,鼓励银行去摸索“供应链金融+零碳”模式,它依托核心企业的信用,又把上下游企业的产品碳足迹、碳减排成效给挂起钩来,从而推动整条产业链一起协同降低碳排放。

金融科技与碳金融深度结合,区块链技术让碳排放数据能够从头部到尾被追溯,提升

了市场的透明度,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被用来构建企业环境风险评估的模型,也让绿色项目的筛选得到了优化。某银行通过自然语言交互的方式完成了绿色信贷的审批和配置,审批的效率因此提升了40%。2026年,大模型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应用又进一步扩展开来,它能够协助识别“洗绿”“漂绿”的项目,生成企业的ESG评级,还能对气候风险发出预警,推动绿色定价走向市场化。

产品的谱系越来越丰富,从单一的绿色信贷正向着碳期货、碳期权、碳资产证券化、碳保险这类多元化的产品体系演进,2025年第三季度,我国ESG公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5344.57亿元,同比增长了30%,成了绿色金融市场上的一块重要的长期资金来源,上海等地已经落地了转型中期票据,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保险等创新产品,覆盖企业在整个生命周期里的低碳转型需求。

四、结语:转型过程中的协同演进

碳金融对传统金融业的影响,具有全方位和系统性的特点,它既拓展出了一个规模上万亿元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也引起了资产再定价、气候风险加大等深层挑战。2026年,绿色金融已经被全面纳入了国家战略体系当中,“十五五”期间会进一步完善碳足迹核算、环境信息披露、激励和约束等基础性机制的安排,给碳金融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金融机构需要主动把碳金融的思维放进自己的战略规划里,一方面要去把握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创新这些业务上的机遇,另一方面也要妥善地去应对高碳资产减值、气候风险上升等挑战,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过程中去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随着碳市场不断完善,金融科技被更深入地应用,碳金融将成为推动金融业转型的一个核心动力,最终让商业价值与环境效益达成协同,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牢固的金融支撑。

作者:李天野(赣南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